

我们个人对组织有什么要求，就打个报告“申请”。比如申请入团、申请入党，还有申请困难补助、以前还有申请住房。战争年代，凡组织中人，结婚也要向组织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办事，等等。这些“申请”，全是“我要什么”。而本文所论及的“申请”，主要是“我不要什么”。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同日隆重举行授予元帅和将军军衔仪式。可是，在此之前，就有不少受衔者得到消息后，请求降衔。比如，罗荣桓得知他将被授予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申请”不要授予他“这样高的军衔”。许光达得知将授予他大将军衔时，心中不安，即于9月10日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诚恳提出“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当皮定钧得知授予他中将军衔时，也“申请”降衔。

当然，由于这几位同志确实是战功卓著，于人民战争事业奉献巨大。所以，他们的“申请”都被“婉拒”了。

今年是建军80周年，又是粟裕同志诞辰100年。粟裕参加过南昌起义，1945年10月，因为他肩负着华中军区主要的工作，所以，中央准备正式任命他为华中军区司令员。但他执意推辞，结果张鼎丞为正，他副之。解放战争时期，他实际上是担任着华野司令员的工作（因为陈毅同志当时已到中原野战军任职），中央又准备据以任命。而他却两次恳辞，中央批准了他的“申请”。

这些事例，都是相当感人的。这些同志牢牢记取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是党的领导，是人民的支持，是谦虚谨慎。这几位老革命，开国功臣，表现出了一种谦虚谨慎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是革命者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革命者所特有的高风亮节。它也在很深的层面上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确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这种精神非常广泛地表现在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这对于党的建设，对于密切党群关系，对于革命的胜利，对于我们搞社会主义，至关重要。他们大多已经去世了，但他们这种精神，却始终激励着后人。是千秋万代的，是永恒的。

革命事业是要靠一代一代人去完成的。“薪火”传到了今天，可惜有的同志竟把这样的光荣传统给淡忘了，甚至是背道而驰了。比如在这“官”的事儿上，有的同志不是打“降衔申请书”，而是致力于打“升官申请书”，以致千方百计，说情、贿选、买官的怪事，层出不穷。为升官之需，假文凭、假入党志愿书、假履历表也造出来了。有人买官，也就有人卖官。所以说，要官、买官并不是单一的事情，而是互为因果的。于是，腐败也就向深层发展了去。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两种人：一种是官念淡薄，不要官而只要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另一种却是不要革命而只要当官，只为自己。这两种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何以形成，何以发展？应当进行深刻的研究，揭示其本质，找出对付的办法，这对保证我们党的健康肌体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是申请

张百年



悠闲的锦鲤鱼

曹瑞祥

大概是1947年1月，鲁南战役前后，我由江苏省苏北地区的华中军区宣传部调往山东，只我独身一人去报到。走了好几天，未料想正逢战事频繁，情况随时在变，幸好半途问到一位骑马的首长，才知道军部已撤离临沂，他告诉了我军部的新地点。要不是这位首长，可能我要遭遇上敌人，想想真险啊！

第二天总算赶上了正在转移途中的军部。这时方知文工团的一团和二团都去了前线。过了几天，通知我说，山东大学文工团已编为军部文工团三团，要我先去三团。同时，从野战军前方送来二十多个军乐队员，军部决定成立一个军乐队，放在文工团三团，要我去负责这个队。当时懂得五线

谱以及和声的人是相当少的，组织上要我担当军乐队工作也有从业务能力方面考虑的因素。记得在军乐队成立后的第一次见面会上，要我当众讲话。我向来不善言辞，毫无思想准备，憋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真把我窘惨了。

这小小的军乐队，乐器配备残缺不全，既无大军鼓也无低音贝司，失去了音乐的根基。当时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为追悼会奏哀乐。于是想出一个应急办法，到庙里向老和尚“征用”了一只中国大鼓，这面鼓一个人背不动，还远没有大军鼓那样浑厚的音响，但有这面“冒充”的大鼓，加强了哀乐的沉重气氛，参与追悼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不久，

笔名“思果”终于抢走了真名的风采，认识他的人仿佛全忘了他叫蔡濯堂，只记得他是蔡思果，是蔡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认识他，我说“濯堂”二字飘着烟雨江南古老宅院的几丝秋意，亦庄亦严，雅秀极了；他喃喃说好是好，稍嫌封建，比不得“语堂”空灵：“你不喜欢思果这个名字吗？”蔡先生愕然一问。我说十分喜欢，又带禅意又好听！蔡先生释然一笑。一辈子那样认真做人，一辈子那样认真做事，难怪思果始终在乎人家怎么看他这个人和他做的事情，连他自己起的笔名也上心。

蔡先生爱说他没上过正规学堂受过正规教育，一生靠自修，我半信半疑：他的中文和英文实在好，比名门高徒还要好。初识那年他是《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跟汤新楣、张复礼鼎足扛起林太乙挂头牌的这本杂志，那是中文《文摘》珠玑字字的年代，香港台湾年轻一代读书界深受沐恩。蔡先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布道似地传布文字的品德，《文摘》退休一度在中大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做访问研究员，跟乔志高、宋淇、余光中、陈之藩消受沙田的清风明月。

八十六岁的蔡思果于二〇〇四年六月八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病逝，岁月是梦，往事是烟，我追忆《文摘》之前我其实早就见过他了，似乎是在张国兴先生请客的席上，似乎是在铜锣湾亚洲出版社的书铺，我刚读完他一九五六年的一本散文集《私念》，满脑子里是书中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大家 Charles Lamb 的影子，蔡先生说蓝姆那篇《Super-annuated Man》害他跟上司闹翻，“一气走出了我服务达十六年之久的举世闻名的



银行”！

读了思果我才用心读蓝姆，客居英伦那些年还苦苦集藏各版本的《Essays of Elia》，E.V.Lucas 厚厚两册蓝姆传也花了大钱买回家死啃。五四以来笔下亮得出晋末清谈逸兴的中国作家都爱过蓝姆，通读蓝姆，模仿蓝姆，周作人练出夜静山空的道行，蔡思果渲染月出鸟惊的

悼念蔡思果先生

董桥

《臭毛厕与洋八股》跟《A Dissertation upon Roast Pig》，一篇是水面上的油花，一篇是水底下的卵石，襟怀云泥。

我做翻译的那些年案头长年供奉韩迪厚和思果的翻译论著，“当”字“被”字“地”字时刻视为禁忌，深恐错手一用，两位前辈鼻孔朝天嗤笑一声：“这是人话吗？”一九六九、七〇给《文摘》翻译的文章一登出来我也总是逐字逐句核对一遍：那到底是思果他们修饰过的文句！这一代人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跟蔡先生那一代人离得近，学会苦读中英文，赚得下半辈子谋生的颜面。《私念》里几次慨叹 Lamb、Lucas、Belloc、Chesterton 那一辈名家都给人忘记了；我想，连那位跟蔡先生论过学的早年港大教授英国名诗人 Edmund Blunden 知道的人也不多了。思果先生如今一走，中西文化古旧的后花园里又少了一块“使流水说出话来”的“石子”，寥落自是难免。我找出那年他给我写的一幅行草，卷轴里掉出他收到我父亲一幅字的谢函：“老伯法书收到。笔力苍劲，结构谨严，弟自南来叹为仅见！时人竞欲以书名世而根基浅薄，以视老伯功力之深，不当愧死耶”。这样的书札，古董也。

其实我们渴望交流

莫小米

她经常为出差的邻居照看宠物，经常打扫楼道，顺手为别人带走门口的垃圾袋。

她豪爽，热心，爱结交朋友。如今邻里之间最多见面点个头，不大串门的，她是个例外。

总之一句话，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人，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否则怎么都把钱借她？

骗子心狠，债主中不仅有小区的居民，10万20万的，她连清洁工、保安、卖菜小贩，三千五千的都不放过。有对清洁工夫妇懊丧地说，她分几次向他们借了一万元，总说马上还马上还，结果……半年的辛苦钱啊。

欠条倒是写的，可她声称自己的身份证丢了还没来得及补办，用的是准儿媳的身份证，复印在欠



平也差一些，但刻苦好学，肯苦练业务，所以进步较快。

由于乐器来自四面八方，各种牌号都有，音高很不一致。再加上不懂得保管，管子都已生锈，无法拔出来。由于通过调节乐器的音高使乐队的标准音一致，要靠伸长或缩短乐器的管子，于是在赶集的日子里就去集市上找铜匠想法把管子拔出来，这样就可以自由调节音高了。由此，我也从中弄清楚了铜管乐器的音高变化的规律，再结合我对乐理中的泛音原理而计算出来同一个音可以有不同的指法。当我在给队员上乐理课时作了讲解，并要他们按照我讲的方法，换另一种指法吹某几个音，果然灵验。他们只学了

金色年华(中国画) 张培楚



张培楚是我三哥，长我5岁，我踏上绘画之道，他是我最早的引路人。在我初中一年级时，他从上海美专去了北海舰队当兵。那时家中有一个箱子里装的全是他的画作，主要是速写与水墨写生，记得在叠得一尺来高的速写中有一些是画得很幼稚的，然而从标明的日期中可以发现，仅仅一年间就变得相当成熟老到了，让我不得不感叹他的悟性。他高中没上完就被上海美术专破格录取了。入伍后又在全军美展中获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那时他才20岁。三哥成为我在同道中的骄傲，学业生涯中的坐标。

他是上世纪70年代末进大学当教师的，但是实际年龄更长。70年代开始，他在市工人文化宫、各区文化馆辅导上课，上海的业余画家中经他教过的还真不少。那时挟着一卷画上门的青年真可用“盈门”来形容。原因很简单，他画得好，人好。培楚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不做假。对那些刻苦聪颖，但又家境贫穷的学生，总是特别的关爱，一刀刀宣纸、一枝枝毛笔赠予他们。

培楚的画与他的人一样朴实、大气，他不喜欢孜孜于琐碎的细节或是玩弄一些表面的小花招。一以贯之的是洒脱灵性的用笔，水墨墨染的韵致，他认为既然是水墨画，当然须充分发挥水墨、宣纸各种媒材的特性。他关注毛笔在宣纸上碰触时的状态，那是一种饱含生命的舞

蹈，笔的枯湿浓淡，握管运腕时的疾徐提按，都将在纸上留下情感痕迹，灵性奔放，行空天马。

培楚的朴实还表现在不随波逐流追赶时尚。近20年来中国画的变革日新月异，然而他循着自己的轨迹平静地画着自己的所爱。他平心静气地研究着写实水墨人物空间有多大。远离固有色的冷灰色调在白底子上的朦胧，更增加了几许逆阳的光感。有时他喜欢用一些浓重的纯色如耀眼的红、刺目的黄，然而与他的浓墨，扎实的造型又很谐和。水的自如应用又是他的一大特色，水在宣纸上的自然流淌、渗化，在明度的黑白灰之余又多了枯湿浓浓的西韵情趣，使其迥异于西方的素描，体现出东方绘画独有的灵性。

“我感怀学画之初对艺术纯真而无求回报的痴情……当我以本能的意识落笔宣纸、水墨的交融、墨色的雄浑令我兴奋不已。也常会从运笔的爽直、动势的节律和节奏中体味音乐般的快感。如果仅以寻找当前艺术样式的差异时尚来定位个性，使艺术个性成了艺术设计的产物，成了满足时尚观众观赏的一桌各色拼盘，那将是画家的悲哀。在经历了学艺、从艺艰辛的旅程之后，享受、沉醉、回味作画过程的欢愉远高于作品的结果和价值。钟情绘画，不就是满足心灵的寄托，来营造自我的精神家园吗？”培楚时常用自己的心得告诫学生。

教师的幸福莫过于看到学生的成才。这些年来在上海的新生代青年画家出自他门下的不在少数，他们的作品在上海的重要展览中可以看到。这些学生不负师情，在老师60岁之际自发举办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师生画展。我们常常感叹世态炎凉，看来并非如此。



明日请看《打得好》一曲创作始末》。



十日谈

烽火文艺兵